

中国城乡就业率的变化与决定因素

——基于 1988 - 2010 年中国城镇收入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严善平*

内容提要 近年来，中国城乡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明显趋紧，人口增加减速、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和就业率下降可能是产生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本文利用中国家庭收入调查 (CHIP) 1988 年至 2010 年的微观数据，定量描述城乡就业率的长期变化趋势，并从地区 (省市)、家庭和个人三个层面对就业率、就业与否的决定机制进行计量分析。通过实证分析，我们得到了以下几点发现：就业率的快速下降主要起因于城镇居民，特别是城镇女性过早退出劳动力市场；中高等教育的迅速扩展推延了年轻人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年龄；城镇离退休人员比率的迅速上升和城镇人口的老龄化加快了就业率下降的趋势。中国经济还处于中等收入阶段，为了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发掘潜在劳动力资源势在必行。为此，要加快改革退休制度，逐步提高法定退休年龄，特别是女性的退休年龄，实现男女退休年龄并轨；消除对女性的就业、晋升和待遇等方面的制度性歧视，提高女性的就业概率；继续大力发展教育，增加人力资本积累，以促进就业率水平的提高。

关键词 城乡就业率 CHIP 调查 制度改革

一 研究背景

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明显减缓，下行压力加大。除了国内外一些周期性因

* 严善平，日本同志社大学，电子邮箱：shyan@mail.doshisha.ac.jp。本文得到日本学术振兴会（项目编号：23252008、15K03482）的资助。感谢日本名古屋大学薛进军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李实教授为本研究提供的优良条件，以及在初稿阶段给予的宝贵意见。

素,起因于自身结构性变化的原因可能更为重要,人口增长减速、劳动力资源总量减少、老龄化加快等与劳动供给相关的结构变化应为首举。众所周知,改革开放以来的高度经济增长得益于丰润的人口红利,但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中国在很短时间内完成了人口转型,过早进入了少子老龄化状态。从全球范围来看,中国的人均收入目前还处于中等水平,但人口已经开始老化,“未富先老”日趋显现。中国政府曾多次提出国内生产总值10年翻番、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等战略目标。正如“十三五”规划中所指出的,经济规模要翻番,就要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为此,必须改革一些不合理的制度,发掘潜在的增长源泉(蔡昉、王美艳,2004;陆旻、蔡昉,2013;郭琳、车士义,2011)。

根据人口普查推算,1990年以来,中国的劳动参与率和就业率都呈现了明显的下降趋势,有工作能力但没有进入劳动力市场,或过早地退出劳动力市场的情况比比皆是。当然,劳动参与率和就业率的变化趋势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和不同性别之间存有一定差异,具体到家庭和个人层次,情况更加复杂多样。为了进一步发掘潜在的劳动力资源,有必要客观把握劳动力资源的利用状况,厘清就业率、就业与否的决定机制。换言之,要搞清楚哪些因素对劳动参与率、就业率的提高或下降有显著影响,在此基础上讨论制度改革对改善现状的可能性和具体的政策措施。

在市场经济较为成熟的国家,政府经常性地在全国范围实施就业和收入等调查,及时公布相关的汇总数据,学者也可以对微观数据进行深度开发研究,为制度改革提供参考意见。相比之下,中国的同类调查还处于发展阶段,有关就业、失业和工资等指标主要来自人口普查,或诸如城乡住户调查和流动人口调查等非连续性的抽样调查。

例如,张车伟和吴要武(2003)、曹佳(2012)和马艳林(2014)分别利用2000年和201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从性别、年龄和城乡角度推算了劳动参与率的总体水平,多维分析了劳动参与率的变化特征。Maurer-Fazio et al.(2006)利用1982年、1990年以及2000年人口普查的部分原始数据,定量描述了城乡劳动参与率的变化倾向。Maurer-Fazio et al.(2009)重点分析了汉族与少数民族在劳动参与率上的差异,并对产生差异的内在机制进行了计量分析。Connelly et al.(2014)和Maurer-Fazio et al.(2011)也利用了人口普查数据,但分析的重点是老年人和城镇的已婚女性。He & Zhu(2015)利用1990年和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实证分析了城镇女性的生育行为与劳动参与的关系。

还有学者利用各种调查的微观数据,对劳动参与率、就业率的基本特征、变化趋势及决定机制做了很好的研究,积累了大批成果。蔡昉和王美艳(2004)利用2001年

5 城市劳动力调查数据，对城镇劳动参与率的变化趋势和是否参与劳动的决定机制做了实证分析；姚先国和谭岚（2005）利用 1998 - 2002 年国家统计局城镇住户的原始数据，对城镇已婚女性劳动参与率和家庭收入之间的内在关系做了详细的计量分析。吴愈晓（2010）、Liu（2012）是利用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nese Household Income Project Survey, CHIP）数据的研究成果，分别对城镇女性的就业行为、城镇劳动力市场中失业与劳动参与率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还有学者利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China Health and Nutrition Survey, CHNS）等大型社会调查的微观数据，实证研究了女性的就业行为与她们的个人特征和家庭背景的关系（Chen et al., 2014；沈可等，2012）。

综上所述，已有文献的分析对象大多只涉及一、两个年份，或者只有城镇住户，有的只限于特定的地区；总体来讲，缺乏一个既有城镇、又有农村，同时还能反映长期变化的研究成果。本文利用业已公开的 CHIP 数据，从城乡两个方面分析考察 1988 年至 2010 年间中国就业率的变化趋势，以及就业率的决定机制，以弥补现有研究的不足。另外还要指出，在现有就业率研究的文献中，利用 CHIP 数据的甚少，仅有的马欣欣（2009）、吴愈晓（2010）和 Liu（2012）在地区和年份的分析上也有同样的缺陷。

本文以下结构如下：首先，利用 CHIP 数据和人口普查等数据，定量描述劳动参与率和就业率的长期变化趋势，观察城乡就业率的长期变化，描述就业率与有关因素的关系；其次，建立计量模型，分别从地区（省市）、家庭和个人三个层次，分析考察教育扩展、退休制度和少子老龄化等因素对就业率的影响；最后，总结实证分析的主要结果，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讨论它们的政策含义。

二 中国城乡就业率的变化趋势

本部分有两个目的，一是概要说明 CHIP 调查的总体情况和数据的基本结构，二是明确就业率的计算方法，观察就业率的变化趋势及其主要特征。

（一）CHIP 数据的结构

CHIP 调查始于 1988 年，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与国内外多家研究机构的大型国际合作项目。抽样调查利用了国家统计局城乡住户调查系统，样本数据具有规模大、覆盖全国城乡和数字可信度较高等特点。课题组在 1995 年和 2002 年还开展了同样的全国性调查，在国内外出版了很多高水平的论文和专著。2007 年以后，以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为中心的课题组开始了新一轮国际合作，他们基本上沿用了

CHIP项目的抽样方法和调查内容。

本项目虽然以收入分配研究为主,但因为调查表中包含了住户常住人口的基本属性、满16周岁人口的就业和收入、未成年子女的教育以及大量被调查人员的主观意识等信息,在劳动经济和社会阶层等研究领域,CHIP数据也得到了广泛利用。

本文利用第一轮三次调查数据和第二轮调查的2007年和2010年数据进行分析,前后跨度22年。伴随社会经济的巨大变化,各次调查的问卷构成、提问方式和选答项目等不尽相同,调查的地区和样本数量也有所不同。前三次CHIP的农村住户调查分别涉及28个、19个、19个省市,城镇住户调查分别涉及10个、11个、12个省市,而2007年和2010年的城乡住户调查仅限于8个省市^①,样本数量也大大减少。

为了动态描述就业率的长期变化趋势,我们对原始数据做了适当的调整。首先,以第二轮调查的8省市为基准,从第一轮CHIP数据中抽出相同省市的原始数据,建立新的数据库;其次,对个人的身份状况、教育水平和政治面貌等项目的选答进行归类。例如,我们把第二轮调查的个人身份划分为6大类型:即就业或离退休再就业人员(从事工资性工作、务农或自我经营者+离退休再就业人员)、离退休人员、在校学生及学龄前儿童、失业、待业或下岗人员(失业人员+待分配/待升学人员/辍学生)、家务劳动者或家庭帮工及其他各种不可分类人员,在此基础上,再对以前各次调查的选答进行归类。尽管某些数字可能存有误差,但通过对数字汇总范围和指标口径的调整,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纵向观察各种社会经济现象的变化趋势。

表1是5次CHIP数据的汇总结果,反映了1988年至2010年城乡住户成员身份状况的变化情况。1988年正值改革开放10周年,这一年的经济状况显现物价猛涨、市场疲软和经济下滑等特点;1995年是南巡讲话之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启程之年;2002年是入世翌年,抓大放小的国企改革虽告一段落,但大批下岗职工给社会带来了较大冲击;2007年是世界经济危机前一年,2010年是中国跃居世界的第二年。在这22年中,社会经济巨变,但构成社会的基本单位,即家庭成员身份变迁却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而且显现了一定的趋势。如表1所示,在农村地区,在校学生及学龄前儿童占家庭成员的比率随时间推移而下降,而就业或工作人员比率有所上升。在城镇地区却表现了不同的结果,在校学生及学龄前儿童比率和就业人员比率都在降低,离退休人

① 农村住户调查包括河北、江苏、浙江、安徽、河南、湖北、重庆和四川,城镇住户调查包括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河南、湖北、重庆和四川。

员比率快速上升。可以推测，这些现象与计划生育政策在城乡的执行力度不同、少子老龄化以及城镇居民的退休制度有关。

表 1 中国城乡住户成员的身份状况

	调查年份	1988	1995	2002	2007	2010
农村住户	就业或离退休再就业人员(%)	57.5	61.0	59.8	65.9	68.7
	离休、退休人员(%)	0.3	0.3	0.4	0.5	1.0
	在校学生及学龄前儿童(%)	0.0	21.5	20.7	21.1	17.8
	失业、待业或下岗人员(%)	0.0	0.2	1.8	0.8	0.8
	家务劳动者或家庭帮工(%)	2.3	4.9	7.5	7.9	8.6
	其他各种不可分类人员(%)	40.0	12.2	9.8	3.7	3.1
	样本数(人)	51122	34495	37969	31620	26216
城镇住户	就业或离退休再就业人员(%)	—	56.7	51.4	49.1	49.5
	离休、退休人员(%)	—	13.7	18.3	21.5	27.9
	在校学生及学龄前儿童(%)	—	19.0	18.6	19.0	14.8
	失业、待业或下岗人员(%)	—	1.9	6.1	5.3	4.2
	家务劳动者或家庭帮工(%)	—	2.0	2.3	2.5	2.4
	其他各种不可分类人员(%)	—	6.7	3.4	2.6	1.3
	样本数(人)	—	21696	20024	14662	10286

注：1988 年数据中城镇住户的该项信息缺失。

资料来源：根据 CHIP 调查数据计算得到。

(二) 劳动参与率和就业率的变化趋势

劳动参与率是反映劳动力资源利用情况的统计指标，也是劳动经济研究的主要对象之一。劳动参与率通常指从业人员和失业者占劳动年龄人口的比率，根据分析需要，也可以把计算对象扩大到一定年龄以上的所有人员。相关的指标还有就业率和失业率，前者指从业人员占劳动年龄人口比率，后者指失业者占有就业意愿的劳动年龄人口（从劳动年龄人口减去在校学生、家庭主妇等人员）比率。劳动参与率与就业率基本上同向变动^①。

CHIP 数据中失业方面的信息不太齐全，农村地区本身也没有失业的概念，所以，本文主要分析就业率指标。考虑到部分离退休人员的再就业现象，下文的就业率原则上表示 16 岁及以上人口中从业者所占比率，在分子中加上失业者，便可得到劳动参与

^① 劳动参与率与失业率也有同步上升的现象。当经济趋好时，部分无业人员重新加入求职行列，成为失业者，抬高失业率（张车伟、吴要武，2003）。

率。考虑到纵向指标的可比性，我们选定了5次CHIP调查都包含的8个省市，图1为中国城乡劳动参与率的变化趋势。为了观察全国的总趋势^①，图中加入了人口普查或1%人口抽样调查的推算结果（曹佳，2012）。显而易见，在改革开放起初的15年中，中国16岁及以上人口的劳动参与率高位稳定，达80%左右，远高于国际水平。此后，劳动参与率迅速下降，到2010年仅有71.0%^②，与泰国和巴西等中等发展中国家水平相当（马艳林，20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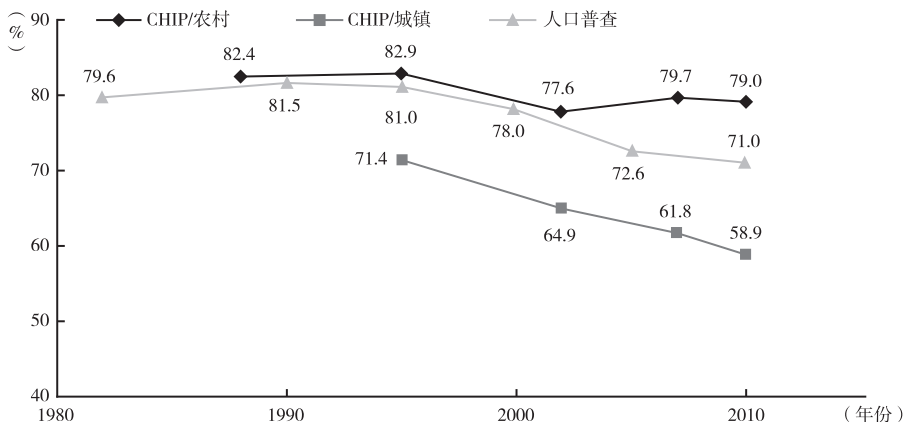


图1 中国劳动参与率的变化

资料来源：根据CHIP数据、人口普查数据和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计算得到。

但是，基于CHIP数据得到的城乡劳动参与率却呈现了另外一番情形，农村的劳动参与率在1995年至2010年期间略有下降，而城镇却从71.4%下落到58.9%。由于样本的覆盖范围有限，汇总数据难以代表全国情况，但至少可以说，1995年以来中国的总劳动参与率一直呈下降趋势，其主要原因在于城镇居民劳动参与率的快速下降。

图2显示了基于8省市CHIP数据汇总得到的城乡男女就业率的变化情况，总体而言，就业率水平在男女之间和城乡之间都存有十分显著的差异。农村男性的就业率水平最高，并且十分稳定；农村女性的就业率低于农村男性，但高于城镇男性；城镇居民中女性的就业率下降幅度最大，在1995年至2010年的15年中猛跌17个百分点，大大超过城镇男性的13个百分点。差异可能起因于城乡从业形态，也可能与退休制度的

① 由于8省市城乡住户样本的比例不一定能反映全国的总体情况，所以没有对城乡混合样本汇总分析。

② 2010年人口普查的城乡劳动参与率分别为68.7%和83.9%，比CHIP数据计算出来的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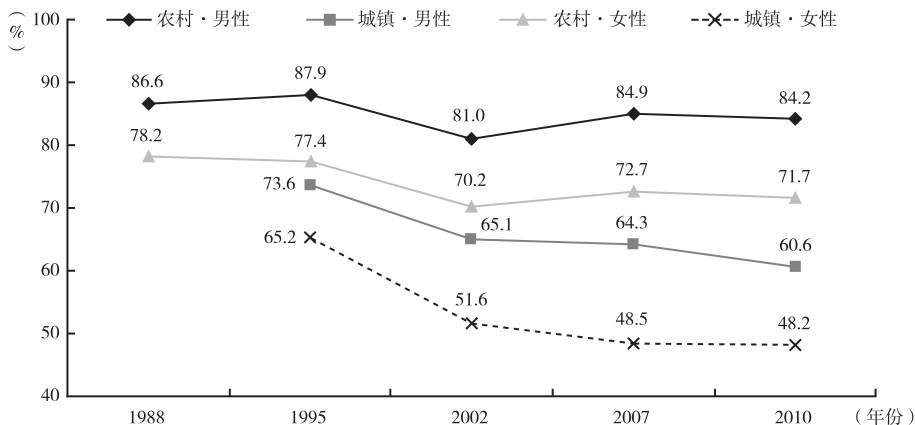


图2 中国城乡男女就业率之变化(8省市)

资料来源：根据 CHIP 数据计算得到。

区别对待有关。中国的农民基本上不享受退休福利，而城镇的一般女性职工 50 岁便可以退休安度余生。

(三) 就业率变化的原因

总就业率与青少年的在校情况有关，与总人口的年龄结构和退休制度等也关系紧密，从图 3 所示的就业率曲线可以窥见上述因素的影响。该图基于 8 省市 CHIP 数据，分别表示 1995 年和 2010 年城乡男女就业率随年龄增加而变化的趋势。可以发现：与 1995 年相比，16~24 岁青少年的就业率显著下降；在 25~49 岁人口中，城乡男女就业率均有所下降，但各自的绝对水平比较相近；在 50 岁及以上年龄层，农村男女就业率均大大高于城镇，在 60 岁及以上的老年人群中，农村居民的就业率还有所上升，女性尤为明显。农村就业率的变化与农村青壮年进城务工、老年人留守家乡可能有关联。

据 8 省市 CHIP 数据汇总，1995 年城镇居民中离退休人员占 16 岁及以上人口比率为 16.6%，2002 年为 20.9%，2007 年为 24.9%，2010 年为 30.7%，15 年中增长了近一倍，女性比男性更高，2010 年达 35.1%，比男性的 26.1% 高 9 个百分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统计，中国参加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退休人员有 8000 多万，退休时的平均年龄只有 54 岁。这表明，中国城镇职工的实际退休年龄不仅大大低于西方发达国家的水平，与中国法定退休年龄也有较大差距。如图 4 所示，在 1995 年至 2010 年的 15 年中，50 岁及以上城镇居民的离退休人员比率均有不同程度的上升（其中，50~54 岁上升 4.4 个百分点；55~59 岁上升 1.6 个百分点；60~64 岁基本持平；65 岁及以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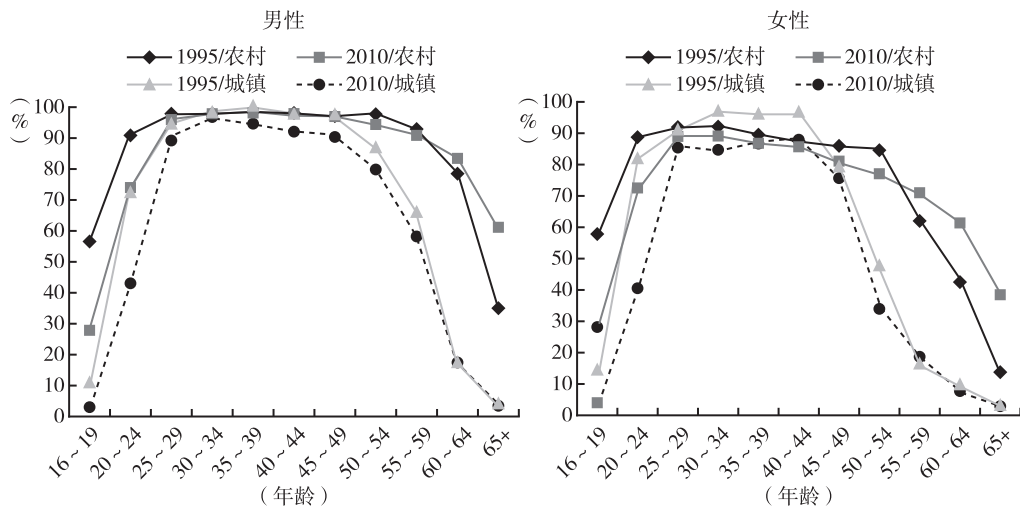


图3 就业率曲线

资料来源：根据CHIP数据计算得到。

老龄人上升了近20个百分点)。这或许意味着中国的社保制度在不断健全、普及，以至于更多的城镇老人可以享受养老保险，但同时也意味着大量的劳动力资源过早地退出劳动力市场。由此，我们应当考虑人口老龄化与现行退休制度相互作用产生的负面影响。

教育事业的发展，特别是中高等教育在进入相对饱和之前的一段时期，年轻人的劳动参与率、就业率与升学率之间存有负相关关系。中学毕业后继续读高中，高中毕业后再进入高校深造的人口比率上升，意味着初高中毕业生直接参与劳动力市场的概率下降，其结果必定是总劳动参与率和就业率水平的下降。当然，升学率达到一定水平之后，这种关系也许会逐渐消失。在此，我们通过CHIP数据考察目前中国城乡教育的基本局面。

图5表示了处于学龄期(16~24岁)的城乡年轻人的在校情况。在各次调查中，家庭成员为住户的所有户籍人员以及其他常住人口，是否是在校学生依据调查时点的身份，与表1的指标对应。中国的高校在读生基本上离家住校，不属于调查住户的常住人口，所以这里所说的在校学生比率应该指普通高中、中等专业学校或中等技术学校的发展情况。显而易见，在1988-2010年的22年中，农村中等教育发展迅速，在校学生占同龄人的比率从1988年的2.1%上升到2010年的34.3%；城镇中等教育也有类似发展倾向，但绝对水平大大高于农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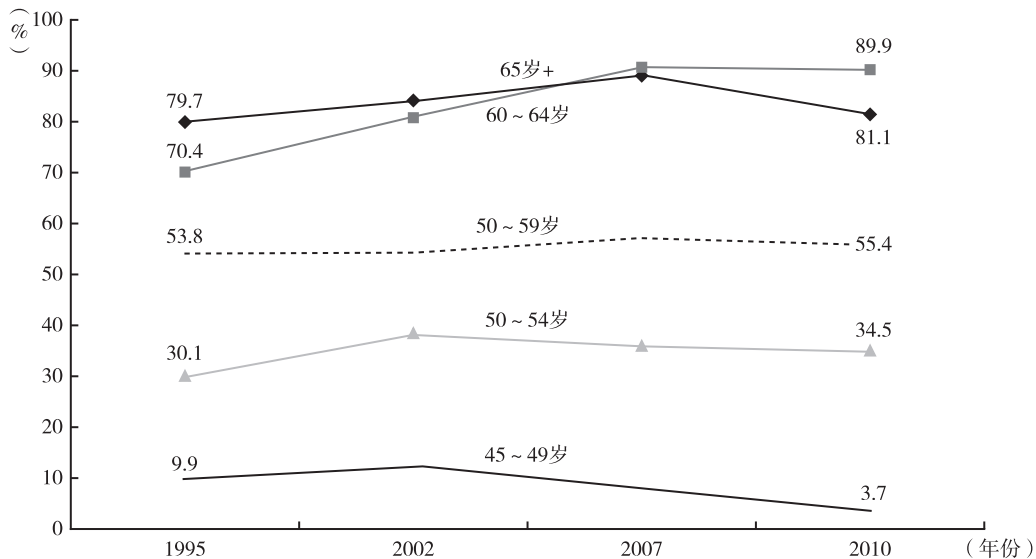


图4 中国城镇按年龄层的离退休人员比率（8省市）

资料来源：根据CHIP数据计算得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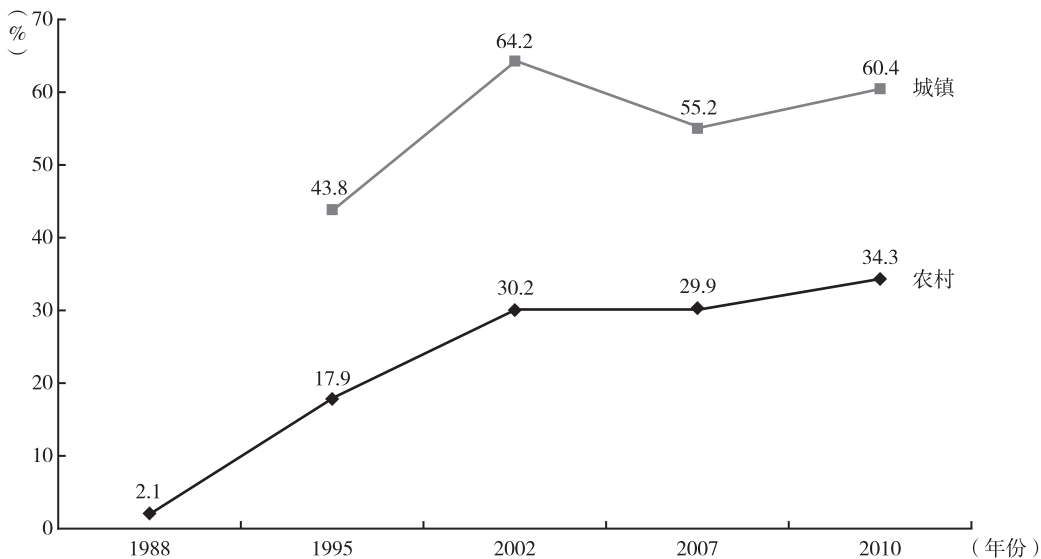


图5 16~24岁人口中在校生比率（8省市）

资料来源：根据CHIP数据计算得到。

三 就业率、就业与否的决定机制

1990年以来,中国总劳动参与率持续下降,主要原因在于城镇居民,特别是城镇女性就业率的急速下降。中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人口老龄化和现行退休制度与此有关,城乡居民的个人特征、家庭生命周期和收入变化等要素对就业行为的影响也不可忽视。为了进一步厘清就业率的决定机制,有必要对可能影响就业率的各个因素进行计量分析,通过多元回归分析,观察各因素对就业率影响的有无、大小以及变化趋势。

(一) 理论假说

有关中国劳动参与率、就业率研究的现有文献,主要集中在分析城镇居民的个人特征、教育水平和政治身份等人力资本以及家庭的生命周期如何影响劳动参与率和就业率。在数字利用方面,大多文献还只涉及2000年代初期,Chen et al.(2014)利用了CHNS2006年数据,是新近的力作之一。本文利用CHIP1988年至2010年的有关指标,把研究的对象期间扩展到2010年,对城乡双方的家庭层面和地区层面也做了相应的分析,可以更加全面地考察就业率的决定机制。

如劳动经济学所述,个人是否参与劳动在较大程度上取决于市场工资的高低,如果工资增加带来的效用大于劳动付出产生的代价,参与劳动的概率就会增大。但是,当工资水平到达某个临界值,工资水平的进一步上升不一定带来劳动供给的增加,甚至会引起劳动供给减少。性别、年龄、民族等个人特征,教育、政治身份等人力资本,家庭成员中是否有幼儿、老人等因素也与劳动供给关系紧密。一般而言,丈夫的收入越高,妻子参与劳动的概率可能下降;家里如果有需要照顾的幼儿和老人,妻子的就业概率也会下降。

基于相关经济理论和文献,我们就中国劳动就业率的决定机制提出以下四个相互关联的假说,并利用CHIP数据对其进行实证分析。

假说1:人口年龄结构影响就业率水平。在不同地区(省市)或居民家庭,就业率与劳动年龄人口比率有正相关关系,与老龄人口比率有负相关关系。即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16~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率越高,该地区的就业率呈上升趋势;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率越高,就业率则呈下降趋势。

假说2:中高等教育事业的扩展推迟年轻人劳动参与的年龄,对就业率水平有负面影响。具体而言,在中高等教育处于扩张阶段的地区(省市),16~24岁青少年中的

在校学生比率越高，总就业率呈下降趋势，两者之间存有负相关关系。这种关系在家庭层面也同样存在，即年轻人中在校学生比率越高的居民家庭，其就业率水平呈下降趋势。

假说3：人力资本与就业率水平有正相关关系。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成年人平均教育年限较长的地区（省市）或居民家庭，其就业率水平呈上升趋势；在个人层面，学历较高的居民选择就业的概率相对增大。换言之，人力资本积累有利于提高就业水平，扩大劳动力市场的供给。

假说4：性别、年龄和民族等个人特征、政治身份及居住地区也影响就业水平。因退休制度影响，男性的就业率水平比女性的高；年龄与就业之间存有倒U型关系；党员身份可能有利于提高就业概率等。这些因素既是就业率模型中的控制变量，其本身与就业率水平和就业概率的内在关系也值得深入考察。

（二）地区（省市）层面就业率的决定机制

中国城乡就业率相异，各省市区之间也不尽相同，我们以CHIP数据中的8省市为对象，对城乡就业率的决定机制进行计量分析。地区层面的就业率可定义为16岁及以上人口中从业人员所占比率，决定地区就业率水平的要素包括男性人口比率、16~24岁人口中在校学生比率、16岁及以上成年人的平均教育年限、16~59岁人口比率、60岁及以上人口比率，在计量模型中还加入了居民的居住地区（东部、中部或西部地区，城镇或农村）和调查年份等虚拟变量。

在展示回归分析结果之前，我们首先观察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的关系。图6表示了5次CHIP数据中8省市城乡住户调查的汇总结果（纵轴表示就业率）。从散点图可以明显看出：男性比率越高，就业率上升趋势越强，两者之间有较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成年人的平均教育年限越长、年轻人中在校学生比率越高、老年人口比率越高，就业率则呈显著的下降趋势；在劳动年龄人口比率与就业率之间看不出明显的相关关系。当然，图6所示的仅仅是两组变量之间比较单纯的表象，要弄清它们的内在关系，必须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即在假定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进一步考察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有无及大小。

表2是省市层面就业率的多元回归分析结果和解释变量的平均值。由于样本的特征所限，在此，我们分别以8省市的城镇样本和农村样本为对象，推测了解释变量的偏回归系数。从解释变量的平均值可以看出，农村与城镇的男性比例几乎相同；但在教育方面，城镇明显优于农村；城镇劳动力人口比率、老年人口比率也比农村高，这与我们的一般理解基本吻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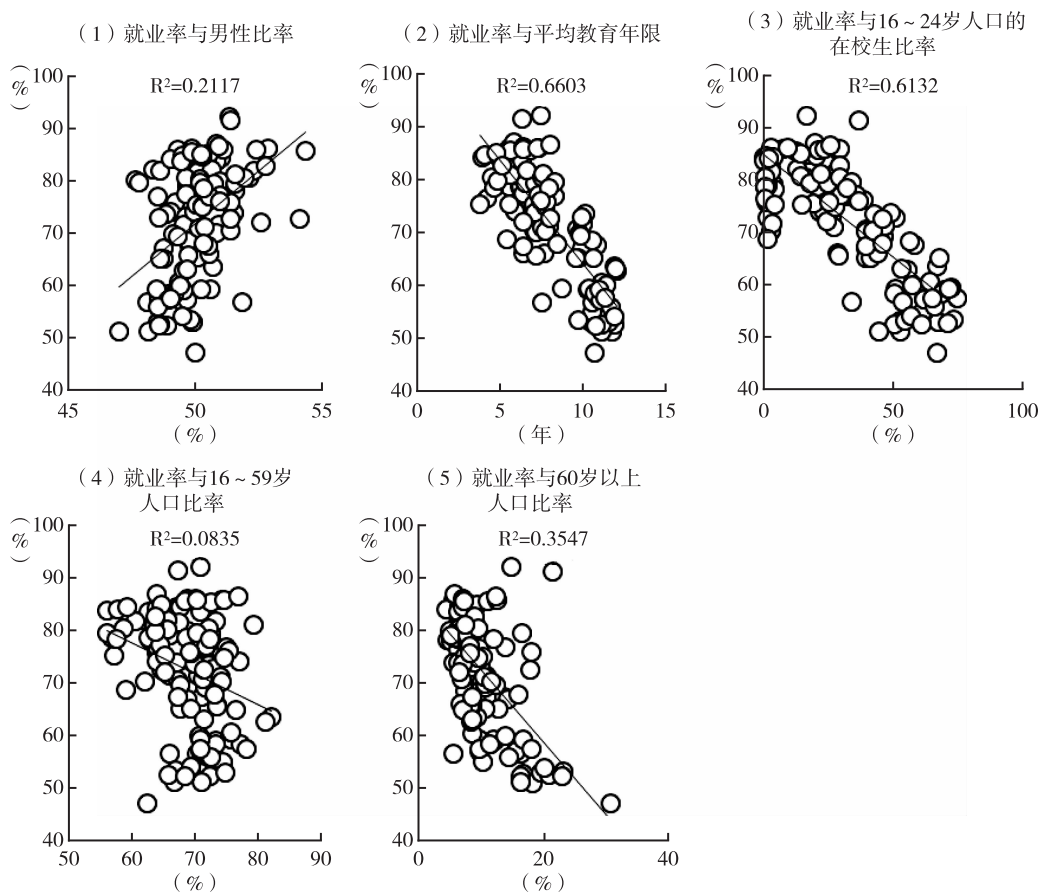


图6 地区(省市)层面就业率的决定因素

资料来源：根据CHIP数据计算得到。

从偏回归系数及其显著水平来看，解释变量与就业率之间的关系似乎不像图6所显示的那样简单。在加入控制变量后的农村住户模型中，对就业率水平有显著影响的仅有两个：一个是年轻人中在校学生比率对就业率的负面影响，即在校学生比率每上升10个百分点，就业率就要下降3.2个百分点；另一个是劳动年龄人口比率对就业率的正面影响，即该指标值每上升10个百分点，就业率上升5.1个百分点。男性比率、平均受教育年限和老年人口比率均没有显现显著的影响。以城镇住户样本为对象的分析结果中，唯有老年人口比率对就业率有显著的负影响，该比率每上升10个百分点，就业率下降10.9个百分点。值得注意的是，城镇和农村，东部、中部和西部之间的就业率均没有显现显著的差异。

表 2 省市层次就业率的决定机制（最小二乘法）

	解释变量的平均值		偏回归系数	
	农村住户	城镇住户	农村住户	城镇住户
常数项			26.041	31.596
男性比率(%)	50.60	49.20	0.193	0.602
16~24岁人口中在校学生比率(%)	20.60	57.10	-0.320***	0.032
成年人平均教育年限(年)	6.50	10.80	6.336	6.785
平均教育年限的平方	43.90	117.20	-0.733	-0.295
16~59岁人口比率(%)	68.00	71.50	0.507***	-0.280
60岁及以上人口比率(%)	8.60	14.10	0.318	-1.092***
东部地区	0.37	0.40	-1.883	1.308
中部地区	0.36	0.40	-1.160	-0.861
1995年	0.22	0.28	4.573*	
2002年	0.26	0.30	2.457	-10.131***
2007年	0.10	0.23	7.782**	-9.314***
2010年	0.09	0.20	9.657*	-5.714**
样本数			81	39
调整后的R ²			0.400	0.903

注：***、**、* 分别表示在 1%、5%、10% 有显著性；东部和中部地区、城镇住户、调查年等虚拟变量分别以西部地区、农村住户和 1988 年调查为参照系（城镇住户的调查年以 1995 年为参照系）。

资料来源：根据 CHIP 调查数据计算得到。

由此可见，在地区（省市）层面，农村就业率与城镇就业率的决定机制相差较大。在中高等教育相对饱和的城镇，教育事业的扩展对就业率降低并无影响，而在农村，中高等教育还有待进一步发展，它对就业率的负面作用不可忽视。老龄化对降低城镇就业率的影响十分明显，而长寿似乎增加了农村地区的就业率水平。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对下面讨论如何克服少子老龄化的影响十分重要。在省市层次，城乡居民的平均教育年限与就业率之间似乎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教育事业发展较快地区的就业率不一定高，教育发展相对落后地区的就业率也未必低。

（三）家庭层面就业率的决定机制

我们再从家庭层面考察就业率水平的影响因素。家庭层面的就业率可定义为 16 岁及以上家庭成员中从业人员所占比率，我们把常住人口、家庭成员的平均年龄、16 岁及以上非在校人口的平均教育年限、年龄结构、家庭成员中是否有党员以及家庭的月均收

人作为就业率的解释变量,进行多元回归分析。表3是依据CHIP2010的估计结果^①,表中数字为解释变量的平均值和偏回归系数。

表3 家庭层次就业率的决定机制

	解释变量的平均值		偏回归系数	
	农村住户	城镇住户	农村住户	城镇住户
常数项			32.765 **	57.519 ***
住户人数(人)	3.89	2.95	-1.542 ***	-6.551 ***
男性比率(%)	52.1	49.4	0.092 ***	0.051 *
16岁及以上非在校人口的平均教育年限(年)	7.7	11.1	0.755 ***	1.227 ***
有党员的住户	0.19	0.31	-2.800 ***	0.440
14岁及以下人口比率(%)	10.4	8.2	0.096 ***	0.648 ***
16~24岁人口比率(%)	15.1	8.6	-0.240 ***	-0.121
60岁及以上人口比率(%)	18.6	23.8	-0.207 ***	-0.401 ***
户月均收入的自然对数	7.6	7.8	12.376 ***	4.789
户月均收入的自然对数平方	57.8	61.6	-0.822 ***	-0.427
江苏	0.14	0.10	-8.747 ***	4.288 **
浙江	0.14	0.10	-4.247 **	1.411
安徽	0.13	0.14	-0.005	1.260
河南	0.14	0.14	1.133	-2.050
湖北	0.14	0.11	7.564 ***	0.073
重庆	0.07	0.10	13.522 ***	2.166
四川	0.16	0.16	0.016	1.317
样本数			4807	2567
调整后的R ²			0.118	0.314

注:***、**、*分别表示在1%、5%、10%有显著性;农村住户和城镇住户的地区虚拟变量分别是河北和上海。
资料来源:根据CHIP 2010调查数据计算得到。

城乡住户的基本特征可大致表述如下:农村居民的户均人口比城镇的要多、男性比率更高,而城镇居民的教育水平、党员户的比率均高于农村居民;农村居民中年轻人和少儿人口比率较大,而城镇居民中老年人口比率较高;城乡住户的家庭月收入(农户为非农就业)有一定差距,但不是很大。所有这些因素对就业率有何影响?从表3的偏回归系数,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几点结论:

第一,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无论城镇还是农村,人口较多家庭的就业率相

① 城镇居民的月收入包括基本工资、奖金、津贴和实物折合的现金,农村居民的月收入指本地非农工作或者外出务工经商人员的工资、奖金、津贴和实物折合的现金。

对较低，男性人口较多家庭的就业率相对较高。在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下，夫妇加独生子女的家庭增多，人口规模较大的家庭往往有老人，故此，就业率呈下降趋势；性别影响就业率水平可能与中国人对就业的传统观念（女性倾向于内当家）有关。

第二，人力资本的积累可以显著提高就业率水平，在城镇住户中，两者的相关关系更强。成人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每增加一年，农村和城镇家庭的就业率分别上升 0.755 个百分点、1.227 个百分点。但是，政治资本对就业率的影响在城乡家庭的表现不尽一致，家庭成员中含有党员农户的就业率显著较低，而在城镇住户中基本上看不出这种倾向。我们推测，在农村住户的党员中，当地的乡村干部、医生和教师所占比重较大，他们多为非农户籍人员，可以享受国家退休制度，因此，党员因素负面影响就业率水平。

第三，反映家庭生命周期的年龄结构显著地影响就业率。老年人口比率越高，城乡住户的就业率水平均呈现了非常明显的下降趋势，城镇住户尤甚^①。16~24 岁年轻人比率越高，农村住户就业率的下降倾向越强，而城镇住户没有表现出显著的结果。这可能与中高等教育在城乡的发展情况不同有关，因为城镇的中高等教育已趋于饱和，而农村还处于快速扩张阶段。年少人口比率较高的家庭，其就业率也较高，城镇住户中的这种倾向尤为突出。

第四，在农村住户中，随着非农收入水平的上升，就业率表现出了上升的趋势，但收入超过一定界限后，就业率转向下降，呈现了倒 U 型变化趋势^②。在城镇住户中，这种倾向不是很明显。

（四）个人层面就业与否的决定机制

最后，我们从个人层面来考察就业选择的决定机制，即哪些因素对个人是否选择就业有显著影响，哪些无关紧要。这里的被解释变量可定义为就业与否，与表 1 的身份状况相对应。调查时选答“从事工资性工作、务农或自我经营业，或离退休再就业人员”的为 1，选答其他的为 0；本部分以 16 岁及以上成员为分析对象。因为被解释变量的数值为 1 或 0，我们采用概率模型，计量分析个人特征、教育和党员等因素对就业行为的影响。表 4 是利用 CHIP2010 年的数据进行估计的结果，除了解释变量的平均值，表中还列有 Logistic 模型的回归系数、odds 比等。

① 王莹莹和童玉芬（2015）从宏观层面计量分析了老年化与就业率的关系，得到了与本文相似的结果。

② 马彦林（2015）利用 20 国集团（G20）当中 19 个国家 1978-2012 年的截面数据，分析了收入水平与就业率的关系，得到了与本文相同的分析结果。

表4 家庭成员就业与否的决定机制

	解释变量的平均值		农村住户		城镇住户	
	农村住户	城镇住户	B	Exp(B)	B	Exp(B)
常数项			1.216	3.375***	-9.011	0.000***
男性	0.51	0.49	1.205	3.335***	1.084	2.957***
年龄(岁)	43.19	47.25	0.106	1.111***	0.541	1.718***
年龄的平方/100	21.43	24.97	-0.162	0.850***	-0.711	0.491***
已婚	0.77	0.81	0.213	1.237**	0.826	2.284***
汉族	0.95	0.95	-0.635	0.530***	-0.442	0.643**
本科及以上	0.01	0.14	-0.180	0.835	0.546	1.727***
大专	0.02	0.16	-0.254	0.776	0.735	2.085***
初中	0.47	0.24	-0.182	0.833**	-0.303	0.739***
小学	0.38	0.11	-0.344	0.709***	-0.331	0.718***
党员	0.06	0.16	0.039	1.040	0.353	1.424***
东部地区	0.34	0.33	-0.755	0.470***	-0.081	0.922
中部地区	0.44	0.41	-0.100	0.904*	-0.211	0.810***
样本数			20692		9134	
Cox-Snell R ²			0.140		0.425	
Nagelkerke R ²			0.239		0.569	

注：***、**、* 分别表示在 1%、5%、10% 有显著性；各虚拟变量的参照系分别为女性、未婚、少数民族、高中、农村住户、西部地区；“B”为偏回归系数；“Exp(B)”为相应变量的 odds 比。

资料来源：根据 CHIP 调查数据计算得到。

依据表 4 的结果可以发现，性别、年龄和民族等属性变量对个人是否选择就业有显著影响。具体而言，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男性比女性选择就业的概率更高；年龄与就业选择之间存有倒 U 型关系；已婚人员比未婚者选择就业的概率更高（城镇居民的倾向尤甚）；与少数民族相比，汉族选择就业的概率相对较低。

教育水平对就业与否的影响在城乡居民中表现不尽相同。在农村住户中，拥有高中及以上学历人员的就业选择大致相同，而初中、小学及以下人员选择就业的概率显著低于高中毕业；在城镇住户中，大专、大学及以上学历持有者的就业概率显著高于高中程度人员，而初中及以下学历人员选择就业的概率显著低于高中程度人员。这表明，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城镇居民的教育水平对是否选择就业的影响程度比农村居民的更大；但同时需要指出，无论城镇还是农村，教育水平的上升有利于提高个人选择就业的概率。这一点与家庭层面的分析结果完全一致。党员身份在农村居民的就业选择中几乎没有什么影响。但是，在城镇居民中，与一般群众相比，拥有党员身份的居民就业概率显著更高（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

为了纵向考察各要素对就业选择影响的变化趋势，我们采用了与表 4 相同的方法，

对 CHIP1988 年、1995 年、2002 年和 2010 年的城乡数据进行了 Logistic 回归分析，图 7 反映的是模型中性别、年龄、民族、党员身份和教育等变量 odds 比的变化。如图 7 所示，在 1988 - 2010 年的 20 多年中，个人特征、人力资本或党员身份对个人的就业选择均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影响还呈现了某种趋势性的变化。概言之，男性较女性的就业优势在 1988 - 1995 年间急剧下降，而此后相对平稳，并且该趋势在城乡大致相同；汉族较少数民族的就业优势在城镇和农村都有所弱化，在农村居民中表现尤为突出；党员相对于一般群众的就业优势在城乡双方也有弱化倾向，城镇尤甚；教育水平对城镇居民的就业选择影响较大，高学历人员选择就业的概率呈上升趋势，对农村居民而言，结论也大致相同，即低学历者的就业优势弱化、高学历人员的就业概率相对上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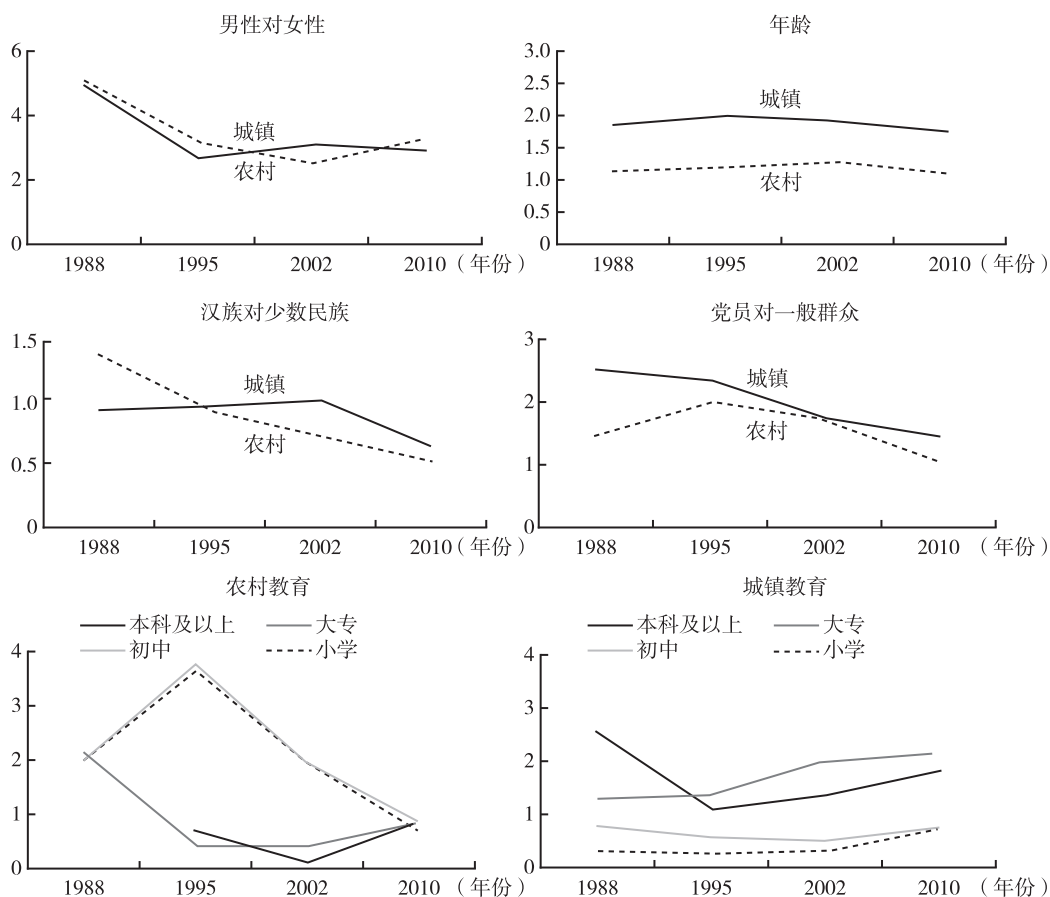


图 7 各要素对家庭成员就业与否的影响程度 (odds 比) 及变化趋势

资料来源：根据 CHIP 数据计算得到。

四 结论及其政策含义

本文利用1988-2010年的中国城镇收入调查数据,分别从地区(省市)、家庭和个人三个层面,实证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居民就业率的长期变化趋势和决定机制。本研究发现:1990年代以来,中国的总劳动就业率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农村相对缓慢,城镇较快,而城镇女性尤甚;无论是城镇还是农村,男性的就业率水平均显著高于女性,但这种相对优势在1995年以后没有大的变化,并且城乡的性别差异大致相同;教育(人力资本)可以显著提高就业率水平,或提高选择就业的概率,对城镇居民而言,其效果更为明显;在农村地区,有待进一步扩展的中高等教育必将推延年轻人参与劳动力市场的年龄,负面影响就业率水平,但在城镇地区,中高等教育扩展的余地有限,对就业率负面影响的局面已告终结;60岁及以上人口比率(老龄化)对城乡居民就业率都有非常强的负面影响,基于家庭层面的分析表明,老龄化每上升10个百分点,城乡居民的就业率水平分别下降4个百分点、2个百分点。

由此可见,城镇化、农村教育的进一步扩展和老龄化都会增强就业率下行压力。中国经济还处于中等收入阶段,为了避免陷入停滞状态,缓减就业率的下降速度、发掘潜在劳动力资源势在必行。为此,要加快改革退休制度,逐步提高法定退休年龄,特别是女性的退休年龄,实现男女退休年龄并轨;消除对女性的就业、晋升和待遇等方面的制度性歧视,提高女性就业概率;继续大力发展教育,增加人力资本积累,以促进就业率水平的提高。

本研究的结果大多基于CHIP1988年至2010年所覆盖的8省市城乡住户,就业率等指标的汇总数字可能难以代表全国的总体水平,但从汇总数字中观察到的变化趋势还是很有参考价值的。住户调查样本较大,计量分析结果有较强的统计显著性,可以说从分析结果得到的政策含义有较强的说服力。

参考文献:

- 蔡昉、王美艳(2004),《中国城镇劳动参与率的变化及其政策含义》,《中国社会科学》第4期,第15-27页。
- 曹佳(2012),《我国劳动参与率变化分析》,《中国劳动》第11期,第5-10页。
- 郭琳、车士义(2011),《中国的劳动参与率、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中央财经大学

学报》第9期，第45-51页。

陆晔、蔡昉(2013)，《调整人口政策对中国长期潜在增长率的影响》，《劳动经济研究》第1期，第35-50页。

马欣欣(2009)，《中国城乡已婚女性劳动供给的决定机制》，《亚洲研究》第3期(日文)。

马艳林(2014)，《我国就业、失业及劳动参与现状和特征分析：基于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调研世界》第7期，第6-10页。

马艳林(2015)，《中国劳动参与率变动与“后弯的”劳动供给曲线》，《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第3期，第64-72页。

沈可、章元、鄢萍(2012)，《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下降的新解释：家庭结构变迁的视角》，《人口研究》第9期，第15-27页。

王莹莹、童玉芬(2015)，《中国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参与率的影响》，《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第1期，第61-67页。

吴愈晓(2010)，《影响城镇女性就业的微观因素及其变化——1995年与2002年比较》，《社会》第6期，第136-155页。

姚先国、谭岚(2005)，《家庭收入与中国城镇已婚妇女劳动参与决策分析》，《经济研究》第7期，第18-27页。

张车伟、吴要武(2003)，《城镇就业、失业和劳动参与：现状、问题和对策》，《中国人口科学》第6期，第33-40页。

Chen, Jianxian, Xiaokuai Shao, Ghulam Murtaza & Zhongxiu Zhao (2014). Factors That Influence Female Labor Force Supply in China. *Economic Modelling*, 37, 485-491.

Connelly, Rachel, Margaret Maurer-Fazio & Dandan Zhang (2014). The Role of Coresidency with Adult Children in the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Decisions of Older Men and Women in China. *IZA Discussion Paper*, No. 8068.

He, Xiaobo & Rong Zhu (2015). Fertility and Female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Causal Evidence from Urban China. *MPRA Paper*, No. 65650.

Liu, Qian (2012). Unemployment and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in Urban China. *China Economic Review*, 23(1), 18-33.

Maurer-Fazio, Margaret, James Hughes & Dandan Zhang (2006). Economic Reform and Changing Patterns of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in Urban and Rural China. *William Davidson Institute Working Paper*, No. 787.

Maurer-Fazio, Margaret, James Hughes & Dandan Zhang (2009). A Comparison and

Decomposition of Reform-Era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Rates of China's Ethnic Minorities and Han Majority. *IZA Discussion Paper*, No. 4148.

Maurer-Fazio, Margaret, Rachel Connelly, Lan Chen & Lixin Tang (2011). Childcare, Eldercare, and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of Married Women in Urban China, 1982 – 2000.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 46(2), 261 – 294.

Zhang, Junchao & Shiyong Zhang (2015). Identifying the Causal Effect of Marriage on Women's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in the Presence of Chinese Superstition. *Economics Bulletin*, 35(2), 986 – 997.

The Trend and Determinants of Employment Rate in Rural and Urban China: An Empirical Research Based on CHIP 1988 – 2010

Yan Shanping

(Graduate School of Global Studies, Doshisha University)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upply and demand in the urban labor market is becoming significantly tighter. This change is mainly due to the following points: the growth rate of the total population falling, the population aged between 15 and 64 decreasing, and the employment rate declining. In this paper, we use CHIP data from 1988 to 2010 to quantitatively describe the trends of the employment rate in urban and rural China, and analyzes its determinants from regional, household and individual perspectives. Through an econometrical analysis, we have obtained the following main factual findings. Firstly, the decline of the employment rate in the period under study mainly resulted from changes in employment patterns of urban residents, especially women's retirement from the labor market. Secondly,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significantly delayed the age at which young people began to participate in the labor market. Thirdly, the rapid rise of the proportion of retired employees to the total population, that is, the aging of the urban population, accelerated the declining trend of employment. In order to maintain a normal economic growth rat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should make further reforms in the retirement system and family planning policy to reduce the negative impact of labor supply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Keywords: employment rate in rural and urban China, CHIP data, institutional reforms

JEL Classification: J21, J24

(责任编辑:李雅楠)